

长沙文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主编

16

2000. 12

18

长沙市

长沙文史

第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长沙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

编 审:郑兆欣
责任编辑:梁小进
编 辑:王丽西

长沙文史 第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长沙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开本:大 32 开 印张:9 印张

字数:21 万 印数:1—1500

望城县久久印刷厂 200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长新出准字(2000)第 046 号

目 录

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刘 英(1)
大革命时期二三事	陈伯勋(13)
从抗日救亡到南下长沙	秦雨屏(17)
我在长衡会战初期的一段经历	龙步云(21)
皖南事变前后内幕点滴	潘克智(26)
抗战时期国民党县政管窥	陈浩中(32)
周总理给我们指方向	刘斐章(43)
回忆傅正模将军起义前后 韩子庚口述 韩一心整理	(49)
长沙起义前后	陈泳涛(54)
我在长沙起义前亲历的二件事	钟 山(59)
忆长沙迎解时的新音乐运动	刘式昕(63)
长沙民歌社成立和演出的回忆	朱铁蓉(69)
长沙市文艺区参与和平起义片断	李玉希(71)
长沙和平解放前夕参加学运的片断	黄政海(78)
忆长沙一水厂的建设	潘基础(82)

参加长沙市郊土地改革的经过	黄曾甫(86)
我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回忆	洪 度(90)
入朝作战琐忆	王哲富(99)
抗美援朝时期长沙留美学生的抗议 ...	朱铁蓉(102)
在长沙市政协作调查研究工作	胡瑞采(105)
民政工作三十年片断	杨毓灵(113)
先父龙璋传略	龙祖同(122)
先祖父黄镁辛亥史迹	黄我石(127)
毛主席与父亲龙伯坚的交谊	龙永宁(130)
英勇抗日的何平将军	何众望(134)
志愿军二级英雄曾南生	盛星辉(139)
蒋经国在赣南	邹品璜 陈太先(142)
我所了解的杜聿明	李汉萍(146)
在唐生智家三年多的经历	黄时冀(168)
龙云出走中的一件轶事	张德文(172)
怀念谢声湓老师	黄 天(174)
家父李节坚的生平点滴	李仲伯(179)
朱奎峰和湖南实业银行	
..... 李金秀口述 朱翼湘 王煦生整理	(182)
中医外科专家一文湘舫	文健堃(186)

我所知道的湘绣名家

..... 李凯云口述 万力整理(188)

实验“三化”教育的长沙枫林学校 严 寅(192)

建国前的长沙市平民住宅公用合作社

..... 易甲瀛(199)

长沙市旧城区道路系统修正计划书(一九四六年)

..... (203)

捞刀古镇话沧桑 李仲海(208)

长沙:一九三七年之秋

..... (美)爱德华·盖利克 郑 朴译(211)

长沙:一九三八年之初

..... (美)爱德华·盖利克 曹子洋译(220)

美国驻长沙领事詹森报告书(二)

..... (美)詹 森 魏 民译(231)

日本驻长沙领事馆辖区内情况的报告(二)

..... (日)清水八百一 吴旭东译(261)

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刘 英*

大革命前后,我在湖南长沙,这是我生命的转折时期。在这段时期,我从一个女学生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从一个为个人找出路的倔强女子成长为一个为人民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的共产党员。那血雨腥风的残酷斗争,那同生死、共战斗的同志情谊,至今仍然如钢凿斧砍似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新的生命从此开始

1924年我进长沙女师后,不仅文化知识大有长进,而且革命觉悟也迅速提高。随着大革命浪潮的掀起,我很快就成了反帝、反军阀的学生运动的骨干。我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到街头巷尾向群众宣传演讲,后来同学们选我做学生会的干部,有时还作为代表去向政府请愿、谈判。

由于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受到了学校秘密的党、团组织的重视。进步同学找我谈心,讲革命道理,帮助我提高认识,很快我被吸收加入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参加CY以后,更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去了。

1925年3月的一天,一位好友把我叫到一个僻静处,对我说:“根据你最近的表现,你已经是先进青年中的先进分子了,你愿意加入CP吗?”CP就是共产党,我当然愿意参加。好友告诉我,这是

* 刘英(1905—),长沙人。原名郑杰。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长征,解放后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为张闻天的夫人。

对任何人哪怕是父母兄弟都不能讲的秘密。我立即表示：我会绝对保密的。接着，她给我一张表格，叫我填写。

过了一些日子，湘区党委发来一张通知书，通知我去参加“入校仪式”。那时，内部同学称CY是“中学”、“CP是大学”，“入校仪式”就是入党宣誓仪式。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穿过弯弯曲曲的小巷，在一个偏僻工人区内找到了指定的地方。那是一座破旧的木板小楼，是一个基层工会的活动地点。我回头看看后面，没有尾巴，便赶快走进去，轻轻地上了楼，看到罗学瓚老师（当时为区委委员）正在这儿等候，我高兴地朝他点了点头。与我同一批宣誓的还有其他学校的两个学生，互相不认识，谁也没有询问对方，只是用眼睛对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在宣誓仪式中，墙上挂一面小小的党旗，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特别醒目，由罗老师领我们宣誓。我永远记得入党时立下的誓言：“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宣誓之后，罗老师发给每个人一个小本子：《入党须知》，打开扉页，上面用毛笔写着：“你新的生命，从此开始。”是的，我从此开始踏上了新的征途，把我的一切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在学生运动中锤炼

入党以后，就遇上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浪潮，长沙也沸腾了。在湘区党委的组织发动下，由全省工团联合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发起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青岛在5月28日也发生了惨案）。工人、学生、市民群众的反帝情绪空前高涨。每天都有抗议集会，满街都是拿着小旗的宣传队、演讲队，还有演活报剧的。我在五卅运动中主要是做宣传工作，每天晚上编印传单，准备演讲，一大清早就带着宣传队上街。每次演讲，专拣人多热闹的地方，带

领群众高呼口号，还散发传单。军警来了，立即有人报信，我们便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当时我心里只有愤怒，没有害怕，我的嗓门就是那时练大的。

经过“五卅”运动的锻炼，我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强了。1925年6月，我转为正式党员，10月，担任长沙女师的党支部书记。这时，湖南省的省主席赵恒惕更加反动，为了压制群众革命斗争，对学校防范得更严了。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横加干涉，动不动就出动军警弹压。长沙学生同反动政府常常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我参加了多次斗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1925年11月的一次。

事情是由长郡中学引起的。11月初，长郡中学四年级学生发起筹组学生自治会，被校长张有晋明令禁止。该校学生们即实行罢课，表示抗议。学校不仅不接受学生的合理要求，反对变本加厉，先由省教育司下令开除学生18名，接着警厅将曾三等人逮捕。与此同时，赵恒惕借口兑泽中学学生会的会刊上提出辞退不称职的教员的要求，是受共产党的蛊惑，是赤化，又下令开除19名学生，还派军队进驻长郡、兑泽两校。这就激起了长沙全市学生的愤慨。在省学联的组织领导下，长沙学生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声援活动。11月9日，30多所学校联合起来，派代表向省教育司请愿。强烈反对政府武装干涉教育，要求撤走驻校军警，撤换长郡、兑泽两校校长、释放被捕学生、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我是长沙女师的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斗争。

记得那天我们到教育司门口时，大门开着，任凭我们进去，等我进去后又把大门一关，再没有人理睬。直到天黑，没有人来接谈，也不送吃的东西。他们企图以饿饭断水，来惩戒我们，瓦解我们的斗争。那天天气很冷，我们坐在地上，寒气从脚下传到全身，真是饥寒交迫，但谁都没有喊一声苦。到了半夜，忽然有人翻墙进来，他们给我们送来了烧饼，并且告诉我们省学联又组织了更多的同学继续声援。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关了一天

一夜以后，赵恒惕政府迫于群众的压力，只得把我们放了。这次行动，虽然在当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使我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受到了初步的实际斗争的锻炼。

1926年夏天，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为了迎接北伐军，扰乱敌人后方，动员群众，宣传群众，我每天带着一支十多人的流动宣传队上街演讲，发传单，宣传北伐军的胜利，号召大家支持北伐军，直到天黑才回学校。虽然很累，功课也有些拉下来，但心里是舒畅充实的。这时，对个人的升学，前途，都置诸脑后了。

在省总工会的日日夜夜

为了培养干部以适应大革命迅速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于1926年冬在武昌建立了中共两湖党校，彭述之任校长，讲课的有苏俄顾问鲍罗廷和恽代英、项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要湖南、湖北各送40人去学习，我被选中，我们湖南去的人当中只有两名女同志，我是其中之一。我愉快地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悄悄地从学校走出，我的职业革命工作者的生涯也由此开始。

两个月以后，1927年1月，我从武昌回到长沙。长沙已经从军阀政权下解放出来，工运和农运搞得热火朝天，工人和农民自己的组织省工会和省农会也都成立了。我被分配在省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当干事，负责管理各基层工会的党团组织，还以共产党代表的身分参加市民会议，又抓了几个学校和工厂的党支部工作，参加他们的支部大会，听取汇报……我当时21岁，由于个子小，又梳着两根小辫子，一副中学生模样，人们就亲切地叫我“省工会的小辫子姑娘”。

我不熟悉工人，没有做过工会工作，缺乏经验，心里有些胆怯。省总工会委员长、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郭亮看出我的心理状态，就对我说：“郑杰，莫怕，大胆些，干革命工作嘛，就要胆大，否则反动

派怎么会被我们小郑杰吓跑呢？”郭亮风趣幽默的话，使我又感动，又受鼓舞。

对于郭亮，我早就听过他的许多故事，什么“郭亮智斗赵恒惕的兵啦”、“郭亮带兵捉郭亮啦……”在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时，他带头卧轨挡车，阻止敌人破坏罢工的事迹，更被人们广为传颂。1927年他也才27岁，已经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了。我心里本来就钦佩他，听了他的话，胆子壮了许多。

郭亮还非常实在地教我怎样工作。那时职工运动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发动各行各业工会工人，开展对资本家和把头的经济斗争。我去哪个行业工会联系，他总是把这个行业的特点跟我讲一讲，跟谁联络，任务是什么，以至怎样谈话等都向我交代。晚上到各个行业工会开会，郭亮总是同我一起去，一方面亲自组织，一方面也是有意识带我、教我。凡要举行较大的斗争时，他都要和大家仔细研究斗争策略和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问题等等。我很受启发，可以说郭亮言传身教给我上了怎样做群众工作的第一课。

在郭亮的领导下，省总工会是一个团结和谐的战斗集体，我的任务很多，每天清早就出门东奔西忙，中午一般不回来，街上买块烧饼充饥。晚上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那时工会干部大多住在省总工会机关，晚上回来，在家围着桌子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谈，交流情况，讲讲笑话，就象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我年纪轻，又是女同志，同志们对我就象对小妹妹那样关怀备至，有时候，我实在太累，晚上还有任务，所以吃晚饭时不大说话。他们便要关切地询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遇到什么麻烦事吗？在这里，生活是紧张的，工作也有困难，但我感到温暖、充实。

血腥的“马日事变”

正当大革命轰轰烈烈发展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全国各地军阀和国民党右派顿时气焰嚣张，争相仿效，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时间，湖南长沙也是黑云压城，反革命势力已在调兵遣将，准备围剿长沙的革命势力了。

住在湖北汉口的军阀何键，为加强湖南的反动势力，把反动军官许克祥的一个团调进长沙，同时又指使他在湖南的代表余湘三，秘密串联反动势力，组织了政变指挥部，制造反革命舆论。四、五月间，长沙城内流言四起，一会说，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搞错了，工人农民打倒土豪劣绅是“痞子运动”；一会儿说，北伐军节节败退、被军阀打得落花流水了，国民革命战争已经彻底失败了，搞得人心慌张，无所适从。

我们省工会的干部们一个个又气又急，想方设法向工人解释，向市民辟谣。但谣言仍在扩散，听工友们反映，军队也在不断找岔子，和工人纠察队发生磨擦。郭亮认为这很可能是反动派的阴谋，想找借口，制造导火线、达到公开打击工人纠察队和革命力量的目的。

到5月中旬，情况越来越紧张了，省委已作出部署，作好了应变准备，并通告各县工农武装，要准备就地自卫。5月20日晚，省委开会作出决定，省委几个公开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李维汉、郭亮等人分路转移，就地指挥工作，并成立秘密临时省委。第二天，郭亮回到总工会召集我们开了会，布置应变工作，每人发一个月工资，并叫原来住在省总工会机关里的干部们分散到别处去住，当晚只留几个人留守。我和另一位女同志、互济会主任黄厚纯住到东茅街7号省工会的职工宿舍里。临走前，我将各工会党团员的名单烧了，以免出事时落到敌人手中。

5月21日，那时发电报用韵目代日期，这天是“马”字。那天夜里，天很黑，下着毛毛细雨。我怎么也睡不着，担心着郭亮及留守在总工会的同志们安全。我觉得那晚的气氛不对头，预感会出什么事。大约在夜里10点钟左右，忽然城里枪声大作，我惊呼一声：许

克祥果然动手了。我们从窗口往外看，只见长沙上空一片火光，我们推测：省总工会、省农会、省党校等处被袭击了。机关枪声响了大半夜，外面情况不明，不能贸然去。心里非常不安，担心敌人会来袭击。这时，我思想上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对黄厚纯说：“敌人只要一进大门，我们就摸电门，宁可触电死，也不能被他们逮住！”我这时已抱定了以死相拼的决心。

这一夜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沙“马日事变”。许克祥部袭击了省党校、省工会、省农协等近十处公开的革命机关。虽然我们事先有所准备，但在这次反革命政变中，还是有百余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遭到枪杀。

冒险找组织

5月22日清晨，枪声停了，周围静得出奇，我们猜不透外面形势恶化到了什么程度，但同时又觉得宿舍不是久留之地。我们更想到了学校，湖南很多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是从学校开始的，学校成为我们心目中的革命营垒。到学校去，能得到保护和帮助，说不定还可以同组织接上头。

当时街上已贴出了“铲共委员会”的布告，通缉“共产党首要”李维汉、郭亮、夏明翰等人。我们不敢多看多问，急急忙忙避开人多的地方，穿过小街小巷，来到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来曹子俊（总工会庶务）、李思安（总工会妇女部长）等也来了。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夜，因学校要清校，再呆下去我们就会暴露。曹子俊忽然想到了一个去处，他曾经在瓷器店做过学徒，有个师弟叫罗汉卿，人厚道，又不过问政治。因此，曹子俊建议到他家躲几天，于是我们去了罗家，我和黄厚纯住在他家小阁楼上。这时悬赏捕捉共产党的布告已经贴满长沙城内的大街小巷，城关以及重要的通道也都布置了哨兵。敌人天天在搜捕，天天在杀人。省委李维汉、夏曦等被迫转

移，离开了湖南，其他同志也都隐藏起来了。我想自己既不能回父母家，也无法躲进亲戚家。因为国共合作时期，我的身分是公开的，1927年3月以10名共产党代表中唯一的一名女代表参加市民会议，代表的名单都登载在报纸上，他们不会接纳我。但我相信党组织一定还在，我要千方百计地找到她。

大革命失败后，党转入地下，在失去联系以后，找党的办法之一就是“碰”，在大街小巷转，遇到了同志，也许就接上了头；碰上敌人，就要被抓，被杀。而女同志找党，又多了一重困难，大革命时，开明女性大多剪去了长辫子，改梳短发或短辮。反革命政变后，敌人恶毒地传出“巴巴头，万万岁，瓢巴鸡婆遭枪毙”这样的话，巴巴头指的是旧时妇女脑后的发髻；瓢巴鸡婆就是秃尾巴鸡，以此侮辱剪了短发的女性。我的头发，先梳成短辮子，后来又把它剪成男孩似的短发。因此，曹子俊、黄厚纯认为我出去‘碰’党太危险了，不同意我出去，我坚持说：“我是分管各工会党团组织的，认识的人多，碰上的机会也多。”

我戴了一顶学生帽盖住短发，壮着胆子在街上转。一次，我坐着黄包车经过教育会坪，这里是个敏感的地区，以前曾经是革命群众集会的地方，现在成了敌人的杀人场。过关卡时，哨兵盘问得特别严。他问我：“做什么事去？”我说：“去舅舅家。母亲病了，让我去找舅舅。”为什么不走别的路，偏要从这儿过？哨兵怀疑地追问。我故作着急地说：“绕远路会耽误时间啊，要是母亲病不重，我还去找舅舅做么麻。”哨兵将信将疑，仔细地打量着我，忽然，手一抬，把我头上的帽子摘下来了。我有些紧张，横下一条心准备被逮捕。没想到他只是嘲弄地说了句：“噢，又是一个瓢巴鸡婆嘛！”就挥挥手放行了。大概因为我个子小，看上去还是个学生娃子，哨兵就相信我真是去找舅舅的。

我就这样东碰西碰，已经好几天了。心里焦急，表面还装得悠闲。我专拣人多热闹的地方去。这天，我在长沙南门口佯装逛街，

东张西看看，一会看看布料，一会看看百货，打问打问价钱。忽听有人喊我的名字，定睛一看，是省委干部曹典琦的爱人张业莱。张业莱示意我跟她走，走到僻静处，她轻声对我说：“大家在营盘街7号等你呢，快去吧。”原来，党也在寻找我们，张业莱就是派出来找我们的。我心头一热，眼泪涌了上来。可是现在不是流泪说话的时候，我立即离开张业莱，向接头地点跑去。

在营盘街7号，我见到了自己的老上级、在省委工作的夏明翰、林蔚、何资深、滕代远、翦去病等，还见到接替李维汉担任省委书记的彭公达。他们对我说：“郭亮同志已经离开湖南，只有你最熟悉工会的党团组织情况，我们现在最紧要的任务是马上恢复各级党团组织，在敌人的心脏重新组织斗争”。他们问我：“党团组织的名单还记得吗？”我立即回答：“全记在我心里呐。”有人问我：“敌人天天在杀人，怕么？”我说：“不怕，怕就不会来寻党了。”

他们不是随便问我的，是要我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当时，长沙城内白色恐怖很严重，已经有一大批同志被杀害了。单是我读过的长沙女师就有十几名学生共产党员牺牲，我认识的一名女学生才16岁，因“马日事变”后上街贴标语，被抓去。敌人要她交代指使者和同伙，她拒不回答，就被拉出去枪毙了。枪毙她的时候，一枪没有打中要害，她疼得直喊“妈妈”，她还是个孩子啊，敌人连这样的孩子都要杀害，可见丧心病狂到了什么程度。在白色恐怖中，也有的人害怕了，消沉和退却了。目睹同志们的牺牲，我心中只有仇恨，我决心继续战斗。

转入地下

我投入了新的战斗，立即着手恢复工会中的党组织，以更有力地与敌人斗争。

1927年10月，长江局（代行中央职权）派罗亦农、王一飞同志

来改组湖南省委，由王一飞同志任省委书记。中央决定我为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省委工作全部转入地下，秘密开展。

环境越来越恶劣，生活越来越艰苦。由于党的活动经费太少，我们几乎领不到生活费，饱一顿饿一顿成了常事，大家都毫无怨言。当时，我和王一飞、林蔚等同志都住在省委秘书处，那是租用的老百姓的几间木板房。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注意和怀疑，林蔚改姓熊，这房子就是用他的名义租的，因此户主就成了“熊少爷”。王一飞算是他的表哥，我年纪小，他们都亲切地叫我“毛妹”。

每天我们都在紧张地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记得有一天晚上，王一飞带着一身寒气从门外进来，见我们在等他吃晚饭，他随口问了句：“今天有什么好吃的？”我告诉他，今天要打牙祭，改善伙食了。可他并没有高兴起来，又忽然对我说：“毛妹，这几天你不要出门了。”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他告诉我：“富雅里的那个工会机关被敌人破坏了，陈努力同志也被抓走了。”他爱人报告说：敌人追问什么人到过他们那里，还特别问到你的名字。”我说：“明天一早我还有重要的会，怎么能不出去呢。”他说：“太危险了，明天的会派别人去吧，你先避避。”我听了心里又热又酸，要说危险，一飞同志的处境比谁都危险。我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长沙的大街小巷我跑得熟悉了。有了情况，混到人群中也好，躲进老百姓家也好，总是容易脱身些。而一飞呢，说一口地地道道的浙江方言，对长沙人生地不熟，只要被敌人盯上，真是难得脱身了。可是，一飞却又总是不听劝告，每天不顾安危，冒着寒风，有时还饿着肚子，在外面奔波。

在这期间，我曾和滕代远同志一起在长沙近郊组织农民和农妇参加暴动。原计划1927年12月10日配合城里工人发起“灰日暴动”，不料计划失密，暴动没有成功，党组织再次受到严重破坏。

1927年12月，王一飞被特务盯梢而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几位省委领导同志，党的机关也先后被国民党特务破坏10多处。一下子有6位省市领导和十几位同志被捕，大家心情沉重，也

很焦急。省委为了设法营救这些同志，便派了一名平时不大出头露面的女同志去探监。探监的同志见一飞穿得实在太单薄，对他说：“下次我们给你送棉被、棉衣来。”一飞却态度坚决，他说：“不必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你们再也不要来看我了。”当我知道一飞拒绝让人探监时，难过地流下泪。一飞已经准备牺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想着保护同志，保存革命力量。1928年初农历大除夕这一天，王一飞同志，另外5位省市领导同志，还有14位其他同志，一起在长沙教育会坪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了。临刑时，他们大义凛然，高呼革命口号，直到壮烈牺牲。

向党中央汇报

王一飞等6名省市领导被害，省委机关很难活动。湖南面临的困境，急需让党中央全面了解。当时省委只有何资深（组织部长）、林蔚（秘书长）和我3人。林蔚即将去醴陵，何资深留守长沙，便决定让我扮成学生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要上头派新的省委书记和要钱。送我出发的是刚刚与我结为伴侣的省委秘书长林蔚。临行时，他一再叮咛我：“毛妹，你此行身负重任，一路要经过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数省，路程长，风险多，要尽量少说话，遇到可疑的人，更要谨慎。”

1928年春节刚过不久，我肩负重任，离开长沙赴上海。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一人乘火车出远门，坐的是敞篷火车，北风呼呼地叫，车厢里冷极了，冻得直发抖。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党中央，向党中央汇报！

说来也真巧，元宵节这天我途经汉口转坐轮船，还有些时间，便在江汉关码头附近随便走走。忽然听到身后有人轻声地急促地喊着“小杰”，我回头一看，只见眼前站着一位妇女，身穿花缎子旗袍，发髻高高地盘在头上。我只觉得面熟，却一时想不出是谁了。她